

“形”与“神”：兼谈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

摘要：通过梳理我国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关系，指出高等教育的重点大学建设政策，经“211 工程”“985 工程”到“双一流”建设，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延展性。从“985 工程”到“双一流”建设，走向 2035 的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正在从“形似”走向“神备”，即从全面追随模仿西方大学的外形，转向在实现可比指标与西方大学比肩的基础上，打造中国大学的气质和灵魂。

关键词：重点大学建设政策；“双一流”建设；高等教育评价；2035

“如果以文件、会议和发言中出现的频次为标准，让中国高等教育界选定一个 2017 年度词汇，这个词一定是‘双一流’”。生活在当代中国，我们难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形势变化很快，不断有新词汇出现，有新政策推出，让人目不暇接。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置身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认真梳理不同时期的政策走向，我们也能看到发展的连续性，如目前常说的“现代化”“小康社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其实 20 世纪 50 年代周恩来总理已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概念；70 年代末拨乱反正之后，邓小平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他用“小康社会”来表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含义，而且具体界定了小康社会应该达到的指标。2000 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此看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是相当清晰和稳定的：实现现代化是政府和社会长期追求的目标，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九大上所说的“不忘初心”所包含的内容。如果把这一目标放在 21 世纪已经过去的近 20 年时间里，我们更可以看到其清晰性和稳定性。

整体来说，进入 21 世纪的 4 个“五年计划”，“十五”是提出目标，“十一五”是关键时期，“十二五”属攻坚时期，“十三五”则是决胜时期。几个阶段高度连贯，密切相关。

在当代中国我们理解一个概念，既要看其稳定、清晰的一面，又要看到其发展和变化的一面。综合来看，邓小平时代已经提出“小康社会”“现代化”等概念，甚至提出了“三步走”战略：1990 年、2000 年和 2050 年。1997 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报告对 2020 年的目标界定有了更清晰明确的要求，国内生产总值到 2020 年力争比 2000 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这表现出目标依旧，但标准大大提高。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党的十九大又提出了 2035 年这个中间节点。而且把原来到 2050 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变成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 2050 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提前和标准的提高，表现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

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目标和政策走向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是对当前发展形势的判定。2017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句话就说：过去一年我国面临国内外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交会的严峻挑战，改革进入攻坚期。政府工作报告开宗明义不谈成就而提挑战，并不多见。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召开之时，习近平总书记又非常自信地提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两位领导人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发展形势做出的判断充分显现中国社会的复杂特点，在这样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必然是光明前途与曲折道路的有机结合。

一、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关系定位

对于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及国家现代化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内容和场域上的包容及一体关系，国家现代化自然包含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也必然具有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容；二是作用和功能上的基础与支撑作用，教育现代化和高等教育现代化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具有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基于这种功能上的定位，有学者曾提出建议：将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定于 2035 年，教育现代化的实现目标则保持 2030 年，以此来体现教育优先发展和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应有涵义。

谈及高等教育发展，尽管中国 1998 年之后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但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进程也是势如破竹。2013 年全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32%，全球已经有 100 多个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15%，60 多个国家超过 50%，达到了普及化的阶段，甚至 14 个国家超过 75%。具体到国家层面，我们也能看到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具有很大不同。如发达国家基本是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瑞典在 1960 年至 1971 年间以万人为基数，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使在校大学生数翻两番；法国在同期以十万人为基数，用 15 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学生数翻两番；而中国自 1998 年高校扩招，到 2002 年大学生数占同龄人口 15%，是以百万人为基数，在 8 年内翻了两番。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等教育的数量增长不仅具有规模和速度上的差异，而且在生成和发展机制上并非纯粹自然过程，明显具有政府计划和政策干预的特征。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系统特质时不应忽视的因素。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后大众化阶段之后，几乎面对共同的挑战：一方面办学资源条件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又必须面对快速增长且日益多样

化的需求。美国前加州大学总校长克拉克·科尔曾说过“研究型大学处在国际竞争的前列”，这一道理被很多国家所认同。因此，很多国家出现类似中国的“重点大学建设计划”，即集中优势资源，在较短时间内，建设极少数有竞争力的研究型大学，使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进而带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重组与发展。从这一角度来看，实施重点大学政策并非是使少数学校得益，而是为了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从我国 20 世纪 50 年代的重点大学政策，到 1978 年“文革”之后推出的重点大学政策，到 90 年代“211 工程”“985 工程”，再到现在的“双一流”建设，我们看到国家一以贯之地通过资源调配手段，支持少数顶尖大学建设，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满足国家发展需要的政策选择。“双一流”建设目前已被定义为“在‘211 工程’‘985 工程’之后，第三次体现国家意志的高等教育发展计划”。这种目标导向的政策干预，虽然在不同时期具有干预对象和力度上的区别，但由于宏观目标清晰（民族复兴），功能定位明确（国家发展），政策具有较强的合法性基础，政府可以在既有政治框架内，根据政策实施的阶段性效果进行功能的再调整、目标的再校正，进一步完善政策实施细节，以保证既定目标的不断接近和实现。正因为此，教育部长陈宝生在党的十九大接受记者采访时自信地说：教育体制“四梁八柱”的改革方案基本建立，教育改革进入“全面施工内部装修”阶段。

二、“双一流”建设的内涵和定位

毫无疑问，“双一流”建设是国家发展进入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总结提炼已实施 20 余年的“211 工程”“985 工程”项目的实践经验，在保持总目标不变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大学根

本职能。然而，即便如此清晰连贯的政策，在 2017 年“两会”期间仍引发很多讨论，如“双一流”建设到底应该扶弱还是扶优，应该让“双一流”建设承担拯救落后地区高校重任还是让老牌名校借此走向世界？目前“双一流”建设的“扶优扶强扶特”价值取向已经非常明确，从公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来看与“985 工程”高校名单差异不大。为突出“双一流”建设的政策新意，教育部陈宝生部长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强调：“双一流”不是“985 工程”“211 工程”的翻版，也不是升级版，更不是山寨版，而是一个全新计划，甚至可以说“双一流”是 2015 年以后，我国产生的一个新词汇。关于“双一流”建设“新”的特点可以有不同概括，如从理念、目标和管理层面；从遴选条件、程序、支持方式等角度，本研究将以“中国特色”的凸显为切入点进行分析。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中国特色”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90 年代的重要文件把中间的“的”字去掉，直接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简洁提法，使其涵义更加明确。进入 21 世纪，政治文件中又把“有”字去掉，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涵义更加专属。

中国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位也有一个变化过程。1998 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最初给中央领导准备的讲话稿中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社会主义一流大学”。江泽民同志在百年庆典讲话时将“社会主义”的定语删除了。2014 年又是北京大学校庆之时，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如何理解江泽民、习近平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北京大学发展的期盼及对中国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位？其实这不仅是两位重要国家领导人的思考，也代表了国内各界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问题的普遍关切。

与中国政府正式布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重大战略相伴随的是高等教育领域不断推进的实践和研究探索。2003年3月底清华大学曾组织召开了首届“一流大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讨会，邀请前两批“985工程”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领导和教育研究领域知名学者参加会议，共同研讨涉及一流大学建设的政策、理论与实践问题。虽然会议最初是作为清华大学顾秉林院士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一流大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活动的一部分而召开，但由于研讨问题直接关乎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交流内容有助于各校正在进行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探索，在清华大学校长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联合倡议下，这一小型、高端、专门性会议得以延续，以后每年召开一次。2009年在一系列研讨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九校联盟（C9）”，这就是被国际社会所熟知的“中国常春藤盟校”。现在回顾2003年研讨会上的一些讨论议题和重要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早在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界，无论是著名大学校长，还是教育研究学者，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问题上，已有比较全面和深刻的思考。如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王大中院士当时即明确指出：“世界一流大学应是学校实力、社会贡献及国际声誉的一个综合概念”。“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特征的要求，包括：要有一批一流学科；培养高层次创造性人才；产出高水平原创性科研成果；拥有一支高素质师资队伍；以及充足的办学经费等。这些也正是我们的差距所在，需要我们努力建设与发展。”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正确处理共性与

个性问题，那种完全照搬国外一流大学的指标与办学模式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合适的”。同时，世界一流大学还是一个群体概念。我们“要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群体进行研究，尤其要对一些后起之秀的一流大学进行研究，以利于我们能尽早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为此我们应找出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群体作为参照系”。当时清华大学选择了美国大学联合会（AAU）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群体参照系，用 AAU 院校的平均指标来进行分析，看清华大学与这些大学存在哪些差距。上海交通大学为了找到学校发展的参照系，也研制了国内外大学重要指标分析，之后上海交通大学高教所发展出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现在已成为全球最知名的大学排名之一。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一些反映学校实力的客观数据很重要，对于标识大学水平具有合理性。由于这些指标为世界认可，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参照系，从提升本校在这些指标上的表现做起。

可以说，自从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创造出“世界一流大学”这一特定词汇后，“世界一流”和“中国特色”就一直纠缠在一起，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也一直在进行。总体来看，从 20 世纪 90 年代“985 工程”开始到 21 世纪最初几年，中国顶尖大学的首要任务是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俱乐部。而当时我们连参照系都不清楚，也不知道世界一流大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因此那个阶段的重要任务是搞清楚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门槛，在若干可比指标上与西方一流大学比肩。因此，当时在大学中，特别是主政的大学校长更看重的是提高大学客观可比指标。在提法上往往是先说“世界一流”，后面加“中国特色”。记得 2003 年前后，新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顾秉林院士在其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一流大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会上曾形象地描述这一现象：我们既然要与西方下国际象棋就大大方方地学习人家的下棋规则，不能用下中国象棋的套路下

国际象棋。的确，当时中国的顶尖大学在主要可比指标上与西方著名大学差距很大，所以首先要在提高指标上下功夫，使其“形似”。发展到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顶尖大学在可比指标上已经大大进步，如清华大学，不管是在 QS 大学排行榜、泰晤士报排行榜，还是最严格的软科大学排名中，其排名已稳定进入前 50 名左右。这样的结果使我们必须向前跨步，进一步思考与世界一流大学“形似”以后怎么办？显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硬件建设上，不能只在硬性可比指标上相比肩，还要努力形成体现中国高等教育独特内涵和特色的软环境及氛围，要使中国的大学真正具备中国魂，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应有之义。所以现在的提法是，先提“中国特色”，再说“世界一流”。现在强调“中国特色”和我们过去注重“世界一流”并不矛盾，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水平提升的结果，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新时代实现转型的自然要求。中国高等教育的自信随着其实力的提高而增强，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丰富。

“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名单公布以后引起很大讨论。此次没有让学校申请，也没有公开搞评审，而是由专家组确定指标，指标并不针对具体学校、学科，也不让学校、学科进行分数排队。排名出来以后，很多研究机构尝试进行院校数据分析，以揭示什么因素与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名单（特别是一流学科）相关。如以教育数据分析见长的平方创想公司分别使用本科生人数和研究生人数与大学入选一流学科的数目做相关分析，发现与学校的本科生人数完全不相关，本科生数量越大的学校一流学科的数量反而越少；与学校的研究生数量显著相关，除了中国科学院大学这一特例之外。高校论文数量和一流学科数量高度相关，也有特例，如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高校，被 WOS 收录的论文数在“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处于下游，但拥有 14 个一流学科，这显然是考

虑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特点，体现了“中国特色”。另外，院校的经费数，长江学者、青年千人等学术领军和骨干人数与一流学科数表现出高度相关。可以看出，大学的学科水平建立在高水平人才、高资源支持、高学术产出的基础之上，和研究生人数的高度相关则反映出这些学科同时具有较强的高端专业人才培养能力。

虽然数据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进入“双一流”建设学科所具有的显性特点，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定量研究的任何指标都有其针对性，都是对有限目标进行评价，都有其值得注意的局限性。在使用这些指标时要注意其特点。如在 ESI 学科分类里“工程”（engineer）就是一个学科，在 QS 学科分类里“工程”类有 6 个学科，而清华大学涉及工程类的有 10 个院系。因此，在使用这些指标时我们要理解其特点，要认真分析这些指标与院校学科建设需要之间的联系。ESI 指标、QS 学科排名等虽然很重要，但是，使用时要看到其存在的学科偏好和学科差异性。

最近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以史静寰教授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中标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改革研究”。此后，清华大学又接受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委托，由邱勇校长亲自主持课题“中国特色‘双一流’建设评价标准研究”。这两个课题都面临的共同挑战是要设计出对中国高等教育评价的新思路、新指标、新体系。在此我们集中讨论分析框架的问题，如何设计出在理念和词汇上为国际社会认可，又能在实践中反映中国高等教育特点，体现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这是一个很大挑战。如世界上对高等教育功能定位一般是讲三个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但是在中国，我们又增加了文化遗产，甚至将国际交流也作为高等教育新功能来定位。我们经过初步考虑，新的评价体系要考虑中国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功能

定位，要体现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资源支持，要重视高等教育对社会的综合贡献及影响力，特别是要体现高校作为人才培养机构，学生学习与发展所具有的不可替代作用。现在大家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中国高校不能仅看英文论文的发表来评价大学的学术生产，仅以西方标准难以衡量中国大学的社会贡献。我们考虑设计“基于高等教育综合功能的多维、多层评价指标体系”。初步计划研制数据基础之下的院校“人才培养指数”“学术生产指数”“社会贡献指数”“院校发展指数”。基本目标是：综合目前已有研究成果，形成“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评价的新理念；构建“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综合功能评价的指标体系；搭建“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综合功能评价数据平台；提出“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评价改革的政策建议。

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形似”与“神备”

在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主持的“一流大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课题组首次提出中国社会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并用“形似”与“神备”来概括其本质差异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两者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转型的条件等。当前再来讨论这一问题，我们认为，走向2035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要遵循这样几个基本原则：一是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有机结合在一起，在建设过程中遇到复杂问题，既要有理论研究的引导，更要有中国实践探索的坚实案例支持，认真探索适合中国社会需要和发展节奏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模式。二是将伟大理想与日常工作紧密融合。理想很伟大，工作很平凡，这是中国多年发展进步的常态。我们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扎根于高校日常生活的土壤，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伟业建基于教与学的平凡工作之中。设计的指标要能够评价大学日常运

转所呈现的效率和状态。三是目标的实现要建立在持续有效的途径之上。当前既要坚持目标导向性决策,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也要积极开拓和利用市场、社会等多种资源,大胆突破制度性瓶颈和体制性障碍,使院校拥有更加自主自律发展的条件和空间。四是中国的大学必须要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血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形似”到“神备”,代表了中国的大学从追随模仿外形到打造自身气质和灵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努力挖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生命力和普遍解释力的原创性资源,树立文化自信,使现代中国的重新崛起具有坚实的文化根基。

中国的大学要真正成为“神形兼备”的世界顶尖一流大学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打磨,是2050年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特色”是否就是“神备”的全部内涵?可能不止,但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首先要有中国特色,这是我们现在就要做的。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大学作为“具有民族根基的世界机构”,其“中国特色”并非指中国独有,而是以中国为案例,通过对这片土地上改革探索与创新实践的浓缩提炼,展示后发展的人口大国面对全球化、知识经济及社会转型的多重压力,奋力探索并发展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当前和未来全球重大问题的挑战,提供具有普遍意义、可资借鉴的经验。

国际上的一些知名大学,大都不在乎任何排行榜,因为它们在所有排行榜上都名列前茅。所有大学只有到了那个阶段才能说不在意排行榜,因为那是一种其他大学难以达到的水平和境界。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努力,中国的顶尖大学已经开始了从形似(硬性指标与世界一流大学比肩)向神备(具有中国特色的魂魄)方向过渡。希望到2050年,中国有若干所大学可以自信地说我们达到了神形兼备

的一流水平，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大学排行榜上，还是在不同人的心目中，以及在表征一流大学的各种硬性和软性评价上，我们都能做到一流。

对未来走势的预测，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性，有人说“2015年以后世界进入中国的世纪”，也有人说“中国有可能是21世纪的纸老虎”。不管世界如何看，别人怎么说，我们应该用扎扎实实的建设来证明中国的发展。伟大的国家必须拥有健康而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国要在21世纪成为伟大的国家，必须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作者：史静寰，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8年第3期